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三部曲之一

于风政 著

改造

1949—

1957年

的知识分子

坚决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

教育

批判我的唯心论

嚴格檢討我的錯誤

河南人民出版社

116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三部曲之一

D603.5
Y74

改造

于风政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造/于风政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1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三部曲之一)
ISBN 7-215-04715-6

I. 改… II. 于… III. 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1949~1957 IV. 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7472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375 字数 507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3.00 元

前 言

1949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华民族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对社会进行了全面的革命性改造。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剥削阶级被消灭:一个是地主阶级,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同时消失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集团,这就是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群体。

众所周知,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关注的社会群体,首先是农民,其次就是知识分子。但是,他历来不承认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集团。新中国成立以前,他认为知识分子群体的下层属于小资产阶级,中上层多依附于民族资产阶级;对前者的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使其融化于革命队伍之中,后者则是统战的对象。新中国建立后,社会环境和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毛泽东不但没有相应地调整自己的理论与政策,反而把整个知识分子集团都不加区别地视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对他们实行给工作、给饭吃的“赎买”政策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企图通过这两方面的努力,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充分利用工农革命胜利造成的有利形势,以坚定的意志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以政治运动为基本形式与手段,全面动员政治的、思想的、社会的乃至国家机器的资源,对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群体进

行了日趋激烈的批判斗争。意识形态领域里一个接一个的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打击对象的政治运动,恰如一个不停地释放着无穷能量的强大震源,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之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批判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发生的长期的“左”的错误,正式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实现了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性转折。这个转折是伟大的,但也是迟到的,因为经过30年的努力,“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目标,已基本达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学习运动、批判《武训传》和陶行知先生的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唯心论的运动、清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肃反运动和反右派运动,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一部分人接受“改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一部分人被戴上各种帽子打入“另册”,脱离了正常的社会生活,更多的人则被迫保持长期的沉默。“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群体中那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亦陷入灭顶之灾。经过政治运动的打击和岁月流逝的摧残,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的时候,虽有少数老一辈知识分子重新出现在学术与社会舞台上,但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集团早已七零八落,不再成其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中华民族在1919年至1949年间万分艰苦的条件下聚积起来的这支队伍中不乏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学术大师。新中国建立后,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推进了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其中的一小批人由于特殊的历史机遇曾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如“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研究中国当代史,不能无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翻开了新的一页,知识分子有了光明的前途。但是,历史的创伤是如此之重,以致事情过去十几、二十年后,许多人仍然难以摆脱昨天的梦魇。1987年4月17日,巴金老人在致冰心先生的信中说:我“有时忽发奇想,以为从此自己可以

摘掉知识分子的帽子,空欢喜一阵子。可是想来想去,还不是一场大梦?!不管有没有‘知识’,我脸上给打上了知识分子的金印,一辈子也洗刷不掉了。可悲的是一提到知识分子,我就仿佛看见我家的小包弟。它不断地作揖摇尾,结果还是给送进解剖室。”^① 1995年,季羨林先生在论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特征时说:“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我尝够了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满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也曾得过意,说不高兴是假话。但是,一转瞬间,就交了华盖运,四处碰壁,五内俱焚。”“我从来不相信什么生死轮回。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②

这两位历经北洋军阀、国民政府、人民中国三个时代的学界泰斗、文化大师,当代中国公认的最杰出、最典型的知识分子,今天既为知识界顶礼膜拜,也受到政治家的无比尊崇。在躬逢改革开放盛世、知识分子时来运转之时,他们竟然还要发出如此悲愤的感叹,实在令人惊心动魄。一方面,酷爱自己的国家、民族与人民,以近于宗教徒式的献身精神,不计名利,辛勤工作;一方面,内心又充满着对自身悲剧性命运无可奈何和悲愤不已的情绪,这就是当代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坎坷遭遇,正是导致这种不正常心态的直接原因。要理解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不能不研究他们昨天的历史。

迅猛推进的现代化进程赋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空前伟大的使

① 《巴金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27页。“小包弟”是巴金先生家的一条狗。

② 季羨林:《朗润瑣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6、121页。

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即是对知识分子群体作用的肯定。知识分子要自检、自省，完成群体精神、群体人格、群体文化、群体道德的重建，亦即完成自身的现代化，才能担负起这伟大的责任。历史永远是人类最宝贵的智慧资源和百科全书。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我们需要经常回顾历史，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消失，固然是执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等许多不可抗拒的外部因素的结果，从主体来说，却又是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消解、自我的失落，亦即知识分子群体精神的消失。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自我的失落、精神的变异，除了环境的压迫以外，是不是还缘于本性的自我迷失和潜在的卑贱与怯懦？在五·四运动过后 80 年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回顾与反思先人们的历史，看看他们曾经怎样在社会环境的压力下努力坚守自我，最终却失去了同五·四的精神联系，也失去了知识分子的特质。

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消失，既是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生剧变的结果，又是构成这种历史变迁的一部分。正如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管理体制、执政党的治国模式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 1949 年至 1957 年间基本确定的一样，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集团，也是在同一时期的社会剧变和一连串以知识分子为斗争对象的政治运动中基本完成其精神蜕变并归于消失的。这个过程，是知识分子群体与外部环境双向互动的过程，而这个互动过程，在反右派运动以后即归于停止。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必须研究 1949 年至 1957 年间知识分子的历史。

本书不是执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史，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知识分子史。笔者将着力再现知识分子在那个激动人心的社会变革时代的欢欣与失落、自省与内疚、进步与蜕变，着力反映知识分子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运动中的茫然与被动、逆反与顺从。换言之，本书所研究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精神

怎样一步步得到“改造”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旧中国过来的、以欧美留学生为核心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一步步走向消失的历史。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旧邦新命之际	1
1.1 民国的遗产:以欧美留学生为核心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 集团	1
1.2 跟共产党走:十字路口的选择	6
1.3 跨入新社会:新天新地新感觉	16
1.4 改造的基础:自卑感、愧疚感的产生	22
1.5 政治学习运动:第一个知识分子检讨浪潮	28
1.6 参加土地改革:阶级斗争实践中的思想感情变化	43
1.7 抗美援朝运动:对崇美思想的初步清理	58
第二章 早期的冲突	63
2.1 新生的中国:“旧知识分子”不熟悉的环境	63
2.2 首次文代会:建立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开端	69
2.3 本能的反抗:“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	75
2.4 捍卫文艺独立:阿垅的《论倾向性》与对阿垅的批判	86
2.5 抵制“左”的文艺批评:关于《红旗歌》的讨论	94
2.6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社会转换期的学术与自然科学	99
2.7 两种学术观的交锋:关于朱光潜美学思想的争论	110
2.8 自信心的动摇:冯友兰和柳湜关于学风问题的辩论	116

2.9 全国高教会议:高级知识分子对转换教育模式的抵制	123
第三章 偶像的失落	139
3.1 昧于大势的文教界:对《武训传》和陶行知的歌颂	139
3.2 批判《武训传》:第二个知识分子检讨浪潮	145
3.3 第一个偶像的破碎:对陶行知及“生活教育”的批判	153
3.4 微弱的正义之声:为陶行知先生辩护的人们	162
3.5 党性与道德的冲突:批陶运动中的陶氏弟子们	170
3.6 第二个偶像的破碎:对陈鹤琴及“活教育”的批判	176
3.7 “洪洞县里无好人”:对教育工作者的否定与反否定	182
3.8 不甘寂寞的文艺界:对萧也牧作品的批判	194
第四章 “洗澡”运动	201
4.1 运动的目的:教育改革与党的领导	201
4.2 运动的方式:人人“洗澡”过关	208
4.3 红卫兵运动的先驱:学生斗老师	214
4.4 真假参半的忏悔:第三个知识分子检讨浪潮	220
4.5 欧美派大知识分子的屈服:教育思想的检讨	229
4.6 反科学思潮的泛滥:科学界的检讨与政治批判	240
4.7 文艺整风运动:文艺界的否定与自我否定	249
第五章 短暂的喘息	268
5.1 文艺政策调整的信号:纪念《讲话》的两篇文章	268
5.2 文艺政策调整的动力: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批评	272
5.3 “温和”的教条主义: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讲话	276
5.4 呼唤文艺繁荣:吴祖光关于改变作家生活方式的建议	281
5.5 思想与政策之争:第二次文代会前后冯雪峰与周扬的 对立	286

5.6 一个不该发生的事件:《文艺报》对李準小说的批评·····	293
5.7 忍不住的抱怨:教育界对照抄苏联的不满·····	298
5.8 惶惑的科学界:陈伯达“七月讲话”和《地理学报》事件 ·····	303
第六章 学术思想批判 ·····	310
6.1 思想改造新阶段:清理学术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	310
6.2 首当其冲的权威:对俞平伯和胡适的批判·····	314
6.3 无知批判有知: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 ·····	324
6.4 知识分子的克星:激进派青年群体的崛起·····	335
6.5 运动“改造”人:吴小如先生的“觉悟”过程·····	338
6.6 “两头小、中间大”:批胡适运动中的“旧学者” ·····	343
6.7 借题发挥:文艺界对“左”的倾向的批判·····	347
6.8 双重避险:斗争指向的急剧转变·····	354
第七章 胡风事件 ·····	358
7.1 胡风:特立独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358
7.2 从批判到清算:批判胡风的缘起与发展·····	369
7.3 理论霸权:对胡风及其文艺思想的批判·····	376
7.4 犹太背叛:舒芜倒戈及其群体意义分析·····	384
7.5 欲加之罪: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与按语·····	393
7.6 集体人格:声讨胡风浪潮中的文化名人·····	398
7.7 紧跟政治:声讨胡风浪潮中的诗歌创作·····	410
7.8 人人自危:肃反运动对知识群体的影响·····	416
7.9 胡风事件:知识分子群体心理的转折点·····	423
第八章 早春时节 ·····	428
8.1 沉闷与萧条:胡风事件和肃反后的知识界·····	428
8.2 寒冬不知春:从知识分子会议到政协二次会议·····	432
8.3 惊蛰时分:作协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前后的文艺界·····	442

8.4	五月和风:“双百”方针的提出与讨论·····	454
8.5	八月突破:青岛遗传学会议及对学术界的冲击·····	466
8.6	异军突起:文艺界对教条主义的冲击·····	473
8.7	两极对峙:受到毛泽东批评的两篇文章·····	483
8.8	认识自我:知识界的自我审视与批判·····	490
8.9	乍寒乍暖:1956年知识分子的群体心态·····	501
第九章 群体的毁灭 ·····		509
9.1	由春到夏:走向全面解放思想的道路·····	509
9.2	话语之一:调整执政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516
9.3	话语之二:打破教条主义与发展科学教育·····	533
9.4	话语之三:打破教条主义与繁荣文学艺术·····	560
9.5	话语之四: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与法治·····	571
9.6	话语之五:社会主义的制度、体制与改革·····	593
9.7	反右运动:“旧知识分子”群体的毁灭·····	608
第十章 历史的思考 ·····		612
10.1	从忏悔到沉默:知识分子群体毁灭的轨迹·····	612
10.2	思想改造:非知识分子化的知识分子政策·····	617
10.3	革命中国:一个不适合“旧知识分子”生存的社会环境 ·····	625
10.4	自我审视:知识分子群体毁灭的主观原因·····	630
10.5	回归五四: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方向与使命·····	634
后 记 ·····		639

第一章 旧邦新命之际

民国的遗产:以欧美留学生为核心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集团——跟共产党走:十字路口的选择:——跨入新社会:新天新地新感觉——改造的基础:自卑感、愧疚感的产生——政治学习运动:第一个知识分子检讨浪潮——参加土地改革:阶级斗争实践中的思想感情变化——抗美援朝运动:对崇美思想的初步清理

1.1 民国的遗产:以欧美留学生为核心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集团

中国的近代知识分子集团,是20世纪初期形成的。1905年,清廷废科举,兴学校,全面推行新式教育。1911年,全国已有新式中等学校985所,学生113669人;大学4所,专科学校115所,学生40114人;留学生达到2万人。这些新式学堂的学生和留学生,构成了最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民国元年至1949年,全国的大学和专科学校共培养毕业生约25万人,另有100万左右的肄业生和4万人左右的留学生。粗略估计,民国时期培养的有高等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总数应在150万人左右。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新的社会群体。自清末以至于整个民国时期,向先进的西方学习,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改造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建设现代化的科学、教育

和文化,以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是历经挫折而长期激荡不止的社会潮流。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正是这一潮流的产物。特定的时代背景,先后以日本和美国学制为蓝图的新式教育,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留学生教育,使中国的近代知识分子既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也深受西方政治与文化的影响。他们普遍地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五四一代或是五四精神的传人。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后,这个集团的左翼转向马克思主义,追随共产党;其右翼由信仰三民主义转为信奉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投向国民党。但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左右两翼只是少数人。它的主体是游离于左右两端的自由主义分子,这部分人在政治上崇尚西方式的民主、法治与自由,追求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与经济富强,反对专制、独裁、卖国;在思想上,崇尚科学,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半封建半法西斯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在社会改造的方式与道路方面,主张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逐步改良,反对暴力革命。他们希望把中国改造和建设成为英美那样的实行议会制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始终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主体和领导阶层,因此,应当肯定,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基本上是一个以西方社会价值观念为主导意识、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素养、以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为己任的精英集团。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主导意识、政治倾向、精神风貌,显著地受到留学生群体的影响。清朝末年,大批有志青年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东渡日本求学。他们在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中发挥了先驱与先锋的作用。民国初年,日本仍是留学生的主要去向,但欧美留学生人数剧增。1911年至1949年,仅留美生就达到18000人,其中,1945年至1949年有5000人赴美留学。民国时期的留日生继承了清末留日学生关心政治与社会变革的传统,在政治界、文化界长期占据突出地位。这个群体中出现的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鲁迅、郭沫若等许多著名人物,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政治与文化变革。但是,日本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文明程度远逊于欧美。欧美各国博大深厚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科学精神,崇尚民主、自由、法治的社会价值观念与政治制度,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教育,中国留学生在欧美大学所受的正规的、严格的科学训练,使欧美留学生大多具有自由主义的政治信仰与社会价值取向,也有更好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修养,许多人在留学期间已经取得了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因此,民国时期的教育界、科技界、学术界,长期以欧美留学生特别是留美生为核心。例如,1912年至1929年,清华学校派出庚款生1279人。到1949年,这批人中有大学校长、院长39人,系主任63人,教务长11人。1948年11月当选的81名中央研究院院士,77名是留学生,其中留美生至少有46人,这种情况一直沿续到新中国^①。所以说,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知识分子集团,其核心与上层始终以留学生为主。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群体。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指出:“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① 中国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部,1955年首批学部委员为172人,留学生占90%;1957年增补后的191名学部委员,留学生占91.1%,其中留美生占有留学经历的委员的58%。1981年增补后的400名学部委员,留学生占86%,其中留美生占有留学经历的委员的59.7%。1998年,中科院629位院士中,留学生为507人,占80.6%。留学日本与留学欧美的两个留学生群体的政治与社会价值取向的差别,可以从他们在国共两党中的分布得到进一步的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成员中最多的是留日生、留苏生、赴法勤工俭学生,几乎没有正规的欧美留学生。勤工俭学生大多没有接受西方的正规高等教育,故不宜看做普通的欧美留学生。

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显明的例证。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①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革命性与进步性,正是这一群体所具有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政治体现。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既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也是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残酷现实所致。民国时期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也就特别的强烈。

毛泽东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评价,自然也适用于以留学生为主体的上层知识分子。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出国留学的具体动机不同,政治倾向、专业领域、学术思想不同,但忠于祖国、热爱民族,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学,为国家富强而学,学成后为国效力,始终是这个群体的主导精神。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在欧美著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留学期间已经取得了很高的学术地位。当时的中国长期处在战乱之中,留学生回国后甚至谈不到基本的科研条件与生活条件,他们也许比今天的留学生更有理由滞留不归,然而,他们还是毅然回到苦难深重的祖国。以往曾被人们看做是最“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清华留美生,其爱国精神丝毫不逊于他人。1909年至1924年,清华学校共派出庚款留美生 963 人,在 1924 年以前回国的就有 620 余人。1957 年的中科院学部委员中,这一时期的清华留学生就有 29 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641 页。

陶行知、陈鹤琴、廖世承、侯德榜、蒋梦麟、赵元任、王力、闻一多、梁实秋、李健吾、林庚、钱钟书、吴组缃、曹禺、孙瑜、金岳霖、马寅初、茅以升、罗隆基、周培源、梁思成、汤用彤、杨石先、竺可桢、萨本栋、秉志等人，都是这一时期的清华庚款生。1937年的《清华同学录》载有该校留学生1152人，其中学成回国者1132人，归国率达98%，远远高于今天的留学生回国率^①。在国家贫穷落后、战乱不止的条件下，留学生爱国与否的首要标准，就是看他学成后是不是回国将其才学贡献于祖国。在国内政治斗争中采取何种立场，政治倾向与政治态度如何，主要是对救国建国道路的不同选择，不能成为爱国与否的标志。否认民国时期以留学生为主体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感，就无法理解他们在社会大转折关头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资本主义的现代教育，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们以西方国家为理想的社会蓝图，企图以科学的、教育的、改良的手段，把中国改造和建设成为欧美式的国家。但是，这不能证明他们是完全西化的一群。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大多在发蒙时期即熟读四书五经，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又非常注意对学生灌输传统的伦理道德，因而，知识分子仍然深受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在接受西方的新思想、新科学、新文化的同时，仍然保持着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情感模式、心理特征、行为方式、处世品格，其深层次的心理结构仍然是中国化的，不少人身上有非常浓厚的士大夫习气。他们仍然偏重于关心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并不特别

① 据《人民日报》1999年2月4日报道，最近20年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近32万人，回国总数超过10万人。回国率不足1/3，而且回国人员多为进修生和访问学者，攻读学位的留学生是少数。又据《中国高等教育》1998年第12期一篇文章中的数字，1978年至1997年间我国自费留学生为15.4万人，回国6000余人，回国率仅为4%。